

青少年偏差行為與家庭

陳振盛・李麗雲

壹、前言

家庭是兒童和青少年非常重要的生活世界。家庭因素，如何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過去的研究通常分為二部分討論，其一稱之為家庭結構因素，其二稱之為互動因素。家庭結構通常指的是父母親的社經地位、教育水準、家庭組成（雙親、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等等。家庭結構因素，對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通常被認為是間接的。國內相關的研究，會把社會結構因素當作是控制變項，並認為與青少年行為偏差有關的直接因素，來自與少年有直接接觸或互動的主要照顧者，如父母親、其他家人或保母對養育之實施，使得家庭在養育和教育孩子過程出現一些問題。這一些養育過程所出現的問題是影響少年行為偏差的第二主題，統稱之家庭互動因素。家庭互動因素，包括家庭氣氛、育兒方式、家庭暴力和犯罪的家人或父母親，這一些因素通過社會化過程，直接影響著少年的行為發展。不過國內相關的家庭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因素之解釋，無法提

出一整合性的解釋。本研究將嘗試整理相關的研究文獻，提出一整合性理論，以解釋家庭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影響。

貳、家庭結構因素

一、家庭組成

家庭組成指的是父母的婚姻現況：包括父母離婚、分居、配偶一方死亡、隔代教養等，相對於一般由雙親組成之家庭結構，被稱之為非傳統家庭結構；另外，家庭組成因素，也必須考慮到家庭組成成員個人的偏差傾向，以及孩子的出生序對行為的影響（廖經臺，2002）。家庭型態對少年行為偏差的影響大都是間接因素，而非直接效果（陳羿足，1999），即使如此，離婚、單親、配偶一方死亡和隔代教養，仍然被列為高風險家庭的指標之一。原因在於家庭結構問題被視為影響少年生活的生活世界之一，而且是最初的原生生活世界。

（一）非傳統家庭結構

非傳統家庭指的是，除了離婚以外，還包括分居、配偶一方死亡和再婚。單親家庭隨著臺灣的高離婚率，而日漸被注意到。近十年十五歲以上人口婚姻分配比率，標註為離婚者，由民國 92 年的 5.13% 到民國 101 年上升到 7.52%（內政部統計資料）。再依據內政部民國 99 年單親家戶調查統計分析顯示（註 1），單親家庭總戶數為 32 萬 4,846 戶，占全國家中有未滿 18 歲子女家庭戶數之 11.79%。居住在單親家庭中的孩子，通常來自較低社經地位的家庭、自陳經濟狀況較不佳、親子共處時間較少、家中大人常不在家、經歷較不穩定的居所、友伴和家人的支持都較低等（鄭麗珍，2001）。隨著社會科學的研究，單親家庭因素被認為是影響到青少年行為偏差的因素之一。依據司法院的統計民國 91 年到民國 100 年，少年刑事案件中，父母婚姻狀況不正常者（包括：父母分居、離婚、喪偶和再婚）由 41.4%，到民國 100 年上升為 60%；少年保護事件中，父母婚姻狀況不正常者由 48.2%，到民國 100 年上升為 59%。

在實務上家庭結構被當作背景因素，提供犯罪預防單位在篩選高關懷少年個案時參考，那麼家庭結構如何影響少年的行為？統計上，非傳統家庭結構出現青少犯罪或偏差行為的比率高於一般家庭（侯崇文，2001），但是相關犯罪因素的分析研究，不會將少年之犯罪因素單純的歸因於父母的婚姻現況，部分原因來自少年與家庭的互動關係。一份以 2001 年「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抽取 13319 個隨機樣本

的研究顯示，與原生父母家庭作比較，繼親家庭、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為比率較高，且達到顯著性差異。各種類型家庭少年之偏差行為，以隔代教養家庭之國中生偏差行為比率最高，其次為男單親家庭國中生、再次為女單親家庭之國中生、次為正常家庭之國中生，而男單親家庭國中生容易發生集眾偏差行為（蔡松榆，2003）。同樣的，何俞（1992）的研究也顯示生親家庭的子女，其偏差行為的表現較少於來自單親家庭或繼親家庭的子女。

為何一般雙親家庭少年偏差行為比率會較低？原因在於繼親家庭、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所能提供對少年兒童的控制和監督較少（吳奕萱，2006）。詹宜華（2012）的研究亦指出，缺乏父母監督的青年，偏差行為比率較高。其次，離婚、單親、配偶一方死亡和隔代教養，意味著對孩子的成長和社會化過程出現某一些落差，單親對子女最大的影響在於親職的減少。在心理情緒適應方面，他們常覺得孤單、沒人了解、缺乏安全感、胡思亂想、心情不好、亂發脾氣，在偏差行為方面，則有偷竊、沉迷電動玩具、說謊等情形（謝品蘭，1992）。第三，單親家庭的父母親，一方面要工作又要對孩子的行為監督，有可能力有未逮，最重要是因花太多時間在工作或營生，影響了與孩子建立情感的依附關係，當孩子對家庭的依附，低於對偏差同儕關係的依附時，進一步促進了少年行為的偏差（郭慧敏，2005）。又如，周思源（2006）對國內在學青少年的用藥調查顯

示，家庭型態以單親家庭之青少年學生藥物使用危險性較高，不被家人信任者比信任者其藥物使用之危險高 5.7 倍，也說明的單親家庭明顯監督不足的問題，以及家人彼此不信任關係對少年行為的影響。最後，家庭結構最直接影響的因素，就在與孩子相處時間的多寡，在『生親家庭』結構中，由於與孩子相處的時間較多，母親或父親管教方式，以採用『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為主。但是在『單親家庭』及『繼親家庭』結構中，父親或母親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有限，管教方式以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最多（何俞，1992）。

（二）出生序、家人或手足有偏差行為者

除了父母得婚姻現況，會影響家庭生活的基本條件外，另一個因素是少年的出生序，以及家中成員行為偏差，例如父母親是犯罪者、或兄弟有偏差行為，對生長在其中的兒童少年有何影響？家庭中小孩子多，意味著父母親花在對每一位孩子行為監督的平均時間就會被稀釋，更有可能生活上比較困苦，居住環境更加擁擠，且父母管教孩子的壓力也會增加。另外出生序的差別，意味著得到家庭資源先後次序和多寡，通常老大得到家中最多的資源和關愛，而排行在中間的孩子需求會被父母親忽視，老么又會受到溺愛。這一些種種因素都有可能促進小孩子行為偏差。

對於家庭規模和孩子出生序與少年行為偏差的問題，吳奕萱（2006）的研究指出排行中間、老么者及獨生子（女）比排行老大者的偏差行為比率較高。至於家庭

中，尤其是手足有偏差行為者，對少年行為之影響？陳羿足（1999）的研究指出手足有暴力傾向對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具有影響力。而郭慧敏（2005）的研究也顯示，家中成員有人有偏差行為，會對少年之偏差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其影響效果超過家庭經濟因素、父母教育程度和父母婚姻現況。

二、父母社經地位：家庭收入與教育水準

一般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和家庭的經濟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準有顯著的相關性，父母的教育水準，會透過社會控制和社會學習因素，進而影響少年之偏差行為（郭慧敏，2005）。家庭的經濟問題直接和父母親的社經地位有關，社經地位指的是家庭的經濟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準。研究顯示共有六個因素使得貧窮子女在追求教育成就與生涯選擇上產生影響，這六個因素包括：家暴、貧窮雙親、價值觀與態度、面對身心障礙者家人的照顧、重視外表導致內心的自卑、金錢至上、居處貧民社區的影響（黃聖紘，2004）。通常中、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國中生，比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之國中生有較良好的親子關係，家庭生活適應也較好，攻擊性偏差行為也較少（蔡松榆，2003）。

如果低社經地位又是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或隔代教養，情況可能更惡化。此類家庭之父母，除了一人要兼顧數職，分身乏術，影響到孩子的教養外。例如，繼親家庭之研究顯示，繼父母親之教育程度和

對婚後婚姻之滿意度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之產生有顯著相關（蔡佳芬，1999），亦即，繼親父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滿意度越高，青少年行為偏差之比率會越低。

家庭經濟條件或家庭收入的多寡，決定了孩子的教育品質和營養的獲得。且經濟條件較佳的家庭，較有能力培養兒童的計畫能力，和改善孩子的衝動性格，而計畫能力和衝動性格會影響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進而促進行為偏差（周愷嫻、溫淑盈，2004）。再則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的高低會影響到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模式。管教模式被認為是影響少年犯罪的直接因素。父親教育程度愈高，所採取的管教方式多為「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而父親學歷愈低所採取的管教方式多為「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而忽視型的管教模式，「忽視冷漠」類型時，國小學生偏差行為的平均數最高（許憶真，2003）。

參、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

家庭氣氛指的通常是家人之間的衝突、對立和親子關係，例如爭吵、敵對態度、婚姻不穩、不和諧，或是父母親對孩子的缺乏情感，表現出消極的態度等等。家庭氣氛反向的發展到極端，稱之為家庭暴力和對孩子身體上的虐待。

一、家庭氣氛

家庭氣氛指的是家庭成員所覺知與家人互動的感受，亦即家人之間的相處的融洽和衝突程度，最極端的稱之為家庭暴

力。Moos, R. H. & Moos, B. S. (1975) 認為家庭氣氛有三個面向，包括關係面向、個人成長面向和系統維護面向。關係面向指的是家人之間的凝聚力、衝突性和互相表達關心等。個人成長面向的是家人的獨立、成就、文化知識、休閒和宗教信仰等。系統維護面向指的是家庭規則和家庭責任之維護等。在關係面向，陳羿足（1999）的研究認為家庭氣氛愈良好，意味著家庭關係愈好，使青少年有安穩的生長環境，則其發生犯罪與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便會降低。在家庭系統維護面向上，周美智（2001）的研究認為家庭氣氛並非是主要直接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因素，而是間接因素，而其主要的中介變項為道德觀，亦即好的家庭氣氛，和遵守家庭規則和社會規範的養成有關。

家庭氣氛越好，意味著親子關係和夫妻感情越好。親子關係指的是父母和子女間的關係，良好的母子關係能夠降低國中發生初次竊盜行為和暴力行為，而良好的父子關係則可以減少國中生的虞犯行為（張楓明，2006）。林佩珊（2012）的研究認為親子關係越好，國小高年級偏差行為的比率越低。親子關係與少年偏差行為關係之理論依據來自社會控制理論（Hirschi, 1969），該理論認為親子關係越佳，少年對父母之情感依附越強，則少年發生行為偏差之比率將會越低。不過實證研究發現父親和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對孩子偏差行為之影響會有一些差異。在國中階段，尤其是國一時，少年與父親、母親皆必須保持親密的互動關係，如此對少年之

偏差行為才有抑制效果。當親子關係發生衝突時，父母應採取何種方式，才能降低衝突？研究顯示，父母親採取平權之解決方式，則少年之偏差行為會較少（陳雯君，2008）。

二、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防治法定義，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例如語言和身體上的攻擊，導致受害者身體或精神上立即或長期受到傷害。家庭暴力事件對兒童少年的影響，除了兒童少年直接受到傷害的兒童少年保護事件外，應該還要包括手足暴力和目睹家庭暴力事件。研究顯示兒童虐待同時也會伴隨著婚姻暴力，而且兒童目睹父母親暴力行為越多，受父母親嚴重虐待的情形也越多（譚子文等，2009）。沈瓊桃（2006）以南投縣家暴中心所通報的個案進行調查，初步估計發現，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有顯著的關係，一年內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合併發生率高達 65.2%，包括精神、肢體暴力等各種傷害形式，39.6%的家庭同時有夫妻與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另外有 26.2%的家庭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

生長在暴力家庭中的兒童青少年會有那一些行為反應？一般研究將兒童少年受到家庭暴力或目睹家庭暴力之行為反應，分為外向性行為和內向性行為。外向性行為指的是直接顯現可見的偏差行為，例如攻擊、暴力傷害、逃學、逃家、違規等；而內向性行為，指的是負面的情緒，例如

焦慮、憂鬱、退縮和恐懼等。生長在暴力家庭中的孩子容易產生問題行為和嚴重的情緒問題（陳貞妃，2002），即使只是目睹父母婚姻暴力，亦會傷害親子關係，而且和國中生偏差行為有顯著相關（楊芳梅，2007）。被虐待的孩子外在的行為問題會越來越嚴重，甚至成為老師頭痛的人物和他人眼中的壞孩子（卓紋君等，2004）。曾經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在青春期少年所顯現出來的偏差行為包括攻擊、反社會暴力行為、過度討好、依賴他人、逃學逃家、自我傷害和藥物濫用等（蘇益智，2005）。相對的，雙親暴力傾向愈少，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周美智，2001）。

由兒童青少年遭受到家庭暴力到顯現出偏差行為之間的歷程為何？黃文娟（2005）以 12 位 12-18 歲臺北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女作為研究對象，深入研究偏差少女所遭受之家庭暴力受害歷程，及探討不同家庭暴力類型的受害經驗對少女之偏差行為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少女所遭受到的家庭暴力以肢體暴力者最多。當少女為了逃避父母和家庭成員的肢體暴力，轉而出現逃學逃家的機率將偏高。逃學逃家後，因缺乏生活費用，最常犯下少偷竊、性交易等偏差行為。少女出現犯罪行為後，進而結識有類似行為之朋友，被引誘吸食毒品，更嚴重者甚至出現自殺念頭。

肆、家庭互動模式

父母的管教模式，又包括管教行為和

管教態度。管教行為牽涉到一系列父母親如何運用懲戒和獎勵的手段去控制兒童的行為，這類概念所依據的是學習理論和社會學習理論；管教態度指的是父母面對孩子的態度，包括父母對孩子行為所持有的認知、情感和管教上的行為意圖等。由於家庭互動因素，屬直接面對面的關係，也直接形塑兒童少年之經驗模式和對事件之認知，這一些因素相對於家庭結構，被認為是導致少年行為偏差的直接原因。

一、管教手段

首先，對於犯錯的孩子，父母採取的管教手段，例如體罰手段是否可以阻止孩子的偏差行為，或是反向的結果，反而促進偏差行為？這裡所指的體罰手段包身體處罰、嚴厲批評和直接的物質剝奪。這類研究在美國早期由 Hoffman (1977) 提出，他將獎懲和處罰模式分為(1)體罰式管教 (power assertion)：對孩子的犯錯父母用體罰、威脅、嚴厲批評方式。(2)關愛的取消 (love withdrawal)：對孩子的犯錯父母用溫和的措辭表達失望、情感上表現出拒絕的傾向。(3)歸納引導解釋 (induction)：對孩子的犯錯父母會說明犯錯的原因，以及別人會因為孩子的犯錯而受到傷害等。研究結果顯示，道德發展和父母使用更多解釋和歸納引導式的管教方式有關，且教導兒童同理心的能力。體罰式管教反而會造成兒童學習到不好的榜樣。至於關愛的取消，因兒童已與父母建立某一程度的情感聯繫，所以效果不佳。國內有關管教手段的實證資料包括，呂清發 (2003) 以保

護管束少年為研究對象，採取質性研究方式，研究結果歸納出父母對少年之管教採取體罰式管教模式，易催化少年偏差行為之產生。謝智玲 (2007) 對新臺灣之子的研究顯示，如果父母採取嚴厲的打罵式管教，會導致兒童較沒自信，且容易受同儕朋友影響，而對偏差同儕的依附是捲入犯罪的前兆。

二、管教模式

至於父母面對孩子的管教模式，國內學者常用 Maccoby & Martin (1983) 的二個面向來概念化母親面對兒童的態度，第一是情感面向，情感的接受為一端；情感的敵意和排斥為另一端。第二是控制面向：以對兒童行為之命令和限制作為一端；以不苛求和寬容作為一端。以這二個面向，Maccoby & Martin 提出四種母親面對兒童的管教行為，(1)開明權威型：在情感上接受，但以命令或規定方式要求兒童行為。(2)縱容型或溺愛型：在情感上接受，但是對兒童之行為採取寬容、不要求的方式。(3)獨裁型：在情感上排斥兒童，但是以命令或規定方式要求兒童行為。(4)忽視型：在情感上排斥兒童，對兒童之行為也以採取寬容、不要求方式對待。Maccoby & Martin 研究結果顯示，獨裁型的管教行為和體罰手段相關聯，如此會導致兒童低道德發展水準、低自尊和攻擊性強；縱容和忽視之管教行為，容易導致兒童社會化不完全，而犯罪少年也會和縱容和忽視之管教行為相關。

國內對父母管教行為的實證研究顯

示，開明權威的管教類型，出現偏行為的少年最少。何俞（1992）以臺北市二十一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母群，抽樣 1,290 人，其中生親家庭 462 人、單親家庭 623 人、繼親家庭 205 人。父母管教類型與子女行為表現之關係顯示：父或母親採用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忽視冷漠、寬鬆放任管教方式，子女自尊表現較高，且偏差行為較少。家庭結構與父母管教類型方面：在生親家庭結構中，母親或父親管教方式，採用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最多。在單親家庭及繼親家庭結構中，母親或父親管教方式，以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最多。周美智（2001）的研究顯示，忽視冷漠的父母管教方式，在少年偏差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開明權威和專制權威的父母管教方式。而且黃惠玲（2004）也發現忽視冷漠的父母管教方式，在偏差同儕關係的得分，顯著高於開明權威的父母管教方式，而少年之偏差同儕關係，正是捲入偏差行為的前兆。許憶真（2003）的研究則顯示父母親社經地位愈高，採取的管教方式多為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父母親社經地位愈低，採取的管教方式多為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父母親管教方式是忽視冷漠類型時，國小學生偏差行為的平均數最高。

但也有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出現，如吳奕萱（2006）認為父母是忽視冷漠型和專制型的青少年，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和偏差行為都較多，但是同樣的父母採取寬鬆放任型和父母是開明權威型者的管教模式的青少年，他們的偏差行為也較少。出

現不一致的結果，有可能是管教模式概念比較抽象，以自陳問卷的方式作答一導致偏誤。其次，有可能是父母管教方式不一致所導致。

伍、家庭因素對行為偏差的解釋

一、家庭結構因素對少年偏差行為的解釋

原生家庭作為每一個人的初始生活世界。家庭基本上由三個面向構成，首先是父母的社經地位。父母（家族）社經地位標示著家庭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聯，標示著在廣大的社會層面，家庭所處的社會位置。這一面向牽涉到，家庭由社會環境中取的資源的品質和多寡，例如，高社經地位之家庭的孩子，意味著接受較好的教育、取得較高的醫療和生活品質，住進較高級的住宅區。也由於父母的人際關係網路會影響孩子早期的選擇交友和玩伴，進一步也減少不良友伴對孩子的影響。因此，家庭社經地位主要是透過家庭取得外在社會資源間的多寡、難易，對偏差行為產生間接的影響。

其次，是家庭組成因素對少年行為偏差之影響？家庭組成因素，指的是家庭成員組合的樣態，例如，一般所稱的單親家庭、雙親家庭、隔代教養、以及出生排序和家人是否有犯罪等，這一部分指的是家人組合的品質。同樣的，家庭組合品質，影響了家庭組成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多寡和品質。例如，單親家庭，由於父母一方缺位，只有父或母一人教養孩子，平均

上家庭收入比雙親家庭少，對於孩子的教養付出或是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總平均來說，亦比雙親家庭二人的付出還來的少，這一部分就會影響到孩子對父母行為的解釋，例如父或母親忙於營生，有可能導致與孩子的互動少、品質差，就會影響到孩子接收到的信任和關心感。

第三，孩子出生序的影響？主要原因來自老大或獨子所受到父母之關注和資源的輸入，遠超過老二或其他出生序的孩子，影響孩子對父母親是否公正的質疑。

因此，家庭組成因素對行為偏差之解釋，其一是家庭組成就會影響資源的輸入多寡。其二是來自資源輸入家庭後，家庭組成分子間資源的分配多寡。這是客觀的環境限制，而這類環境限制，最少可以歸因為外在環境進入家庭資源的多寡。資源之多寡與分配方式，間接影響了孩子與父母親互動公正和信任和關心的解釋。

二、家庭互動模式對偏差行為的解釋

家庭互動模式對少年行為偏差之影響？所有的父母在教養孩子的過程都認為是要教好孩子，那麼為何有一些父母教孩子的結果會事與願違？如果摒除有關家庭取得社會資源多寡和分配的問題的客觀制約，如之前所論述的父母社經地位和家庭組成因素的影響，只討論教養方式。那麼我們將製造孩子行為偏差的問題主觀的縮小為單純的家庭互動模式的問題？家庭互動面向，本文分為管教手段、管教模式和極端的家庭暴力。

管教手段牽涉到的是當孩子違反家庭

或社會規範，也就是行為偏差時，要怎麼去導正？孩子不遵守家庭規範的事件繁多，例如學齡前可能只是餐桌上不守規矩、爭玩具打弟妹、以極端情緒方式耍賴或要求買玩具等等；學齡後接觸面更廣可能還包括不遵守家離電視和電腦使用規則、不寫家庭作業、接觸父母所認為的偏差同儕或去一些不良場所如網咖等等。這一些違反規範事件，除了明顯的違反規範外，有一大部分可能只是單純的違反當下父母對孩子的行為期望，例如當下父母要孩子做功課，而孩子想看電視等等。當孩子犯錯或違反規範時，對孩子進行懲罰，不管是口頭和肢體的懲罰，都會造成孩子的負罪感和羞恥感。這類體驗，會讓孩子趨向迴避讓孩子遭受這一強烈體驗的那些情境或他人，但是同樣也會激發個人投向利他的社會行為（Shott, 1979）。當少年能正向重新回應他人對其行為的期待時，羞恥的體驗就能完全被修復，信任和關心的紐帶會被重新建構，如此將有助於少年利他行為被喚起。如果羞恥被否認和壓抑將引發少年的憤怒和敵意，進一步導致他人情感上的疏遠（Scheff, 1990），此時對父母存在安全感將出現嚴重裂痕，而往外尋找具有存在安全感之人際關係，偏差同儕成為最好的依附對象。例如，被界定不被父母、和同儕喜歡的孩子，此時，個人對羞恥體驗會加深，少年的行為越往偏差方向發展，依附偏差同儕。最後少年的行為會被歸類為個人人格問題，如此將導致標籤理論所論述的，以偏差行為來回應對其偏差行為之指控。因此經驗研究認為打罵和

肢體暴力等負向的懲罰手段，會導致反效果，加深了少年之羞恥感，反而促使偏差行為。至於達不到預期行為或違反規範時，以歸納引導和說理作方式，讓少年知道她人對他行為的期待，目的在透過再一次確認彼此的行為期待，修正因少年偏差所引發的信任危機，並再次確認父母的關心。因此，對少年違反規範之行為，管教的重心因應移向再次建立彼此互相信任與關心的情感聯繫，喚起一種移情的認知，引導共享積極的正向情感，以消除少年之羞恥感為目標。

管教模式直接指向有權管教者與被管教者之間，身分配對的情感聯繫，以及行為的強制性權力要求。管教模式被認為由二個面向組成，包括情感的維度和行為要求的維度。情感的維度指的是親子之間的親密性，例如，孩子的要求，父母的回應或拒絕，是否有時間陪伴等等，這牽涉到孩子的需求和期待。依據情感互動理論（social interactional theory of emotions）的解釋推論（Kemper, 1979），如果孩子的需求得到回應，則正向被關心的幸福感將被激發；如孩子的需求或期待被拒絕時，負向的情緒焦慮和憤怒將被激起。父母親對孩子的持續拒絕，親子關係、情感將逐漸淡去，最後將導致孩子對父母信心喪失，孩子的外顯行為被推往權力模式發展，轉向好鬥、易怒、以暴力解決問題。當然，孩子會有很多的無理要求，例如，要買玩具等，父母親的回應方式，應以前文所論述的歸納引導推理方式說明，和孩子建立「需求與回應」之間的信任原則，而非一

味的拒絕孩子的要求。對孩子行為的強制性要求，這一面向通常也和遵守社會、學校和家中的規範有關，更多的一部分，牽涉到父母對孩子預期性或例行性行為的期待，例如準時寫完功課、吃飯、上床睡覺等等。當例行性日常常規，父母不在乎、標準反覆和管教不一致時，將導致孩子無從遵守規範和行為趨向自我中心主義，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在於這類日常生活之互動和兒童的角色讀取（role taking）能力相關。兒童必須在與重要他人的互動過程，學會理解他人的情感，動機和意圖，以此建立相互的信任關係，因此角色讀取的能力被認為和道德認知相關（Chandler, 1973），管教模式的實證研究亦顯示縱容、忽視管教方式易導致孩子社會化不完全，而社會化不完全正是犯罪者的顯著特徵之一。

三、家庭氣氛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解釋

生長在良好家庭氣氛，意味著例行生活世界是穩定和可預測的；而生長在家庭暴力虐待或是目睹家庭暴力事件的兒童，也意味著基本生活世界存在極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Moos, R. H. & Moos, B. S.（1975）所論述的家庭氣氛的三個面向：關係、系統維護和個人成長。其中關係面向涉及到家庭成員間的情感，尤其是孩子需求得到滿足後的被關心；系統維護面向則涉及了家庭規範穩定的運作，家人彼此之間的信任；個人成長面向則涉及孩子對家人，將父母視為重要他人後的學習和模

仿，特別是對父母的認同。而極端的家庭暴力或孩子目睹父母暴力，將信任、關心和認同等家庭的存在安全感之意義建構全然瓦解，最後將導致逃家，或孩子有能力時就離家不歸，尋找另一讓他有存在安全感的場域。而離家和逃家則是進入犯罪生涯的徵兆。

陸、結論

公正和成員被公平的對待和資源被公平的分配有關。家庭作為一個生活世界，必須由外界輸入資源以維持日常生活需要，影響資源輸入的因素如下：例如父母的社經地位（包括收入和教育程度）、家庭組成（破碎家庭、出生序和家人是犯罪者），這一些因素不只影響到家庭資源的輸入，也影響到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例如，出生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老大獲得的資源比老二多很多；父母親使用和掌握資源的比率和分配也比孩子多很多，當家庭資源不足時或匱乏，相對地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就會減少，孩子的需求會被剝奪。因此親子互動第一道意義的建構就是「公正或公平」，公正指的是父母對孩子的公平對待，如對待不公將出現相對剝奪感，影響到下一步信任的意義建構。相關的實證研究顯示，家庭資源多寡和分配不公的問題，對青少年行為偏差的影響是間接因素。

信任指的是必須在生活世界中建立例行性互動的規則和規範。互動規則的建立，意味著對互動的對方不會做出出乎意料的行為，在此一生活世界中彼此雙方的

行都是可以預測的。當孩子違反雙方所建構的規則或規範時，掌握資源或有強制權力的父母或監護人，通常會使用某一些手段，使得家庭規範獲得再確認。但是為了使家庭規範獲得再確認的手段，如果是體罰方式，卻直接影響了兒童少年對父母的情感，也加深少年的羞恥感，侵蝕了孩子對父母的信任，最後有可能以偏差行為方式反應父母對他們的指控。因此建議修補信任關係最好的方式是採取歸納引導的說明的方式。

關心意義的建構和少年的需求，以及父母的回應有關。生活世界要穩定，必須能夠提供成員需求的滿足，如果成員之需求得到回應，必能夠滿足，則彼此的關係會被解釋為「關心」，尤其是具有高位階者（例如父母回應孩子的需求），滿足低位階者之需求。但是沒有信任基礎的關心，通常會被視為假惺惺或是背後有什麼陰謀。當孩子的需求常被拒絕，父母以冷漠和專制去對待孩子的需求，此類缺乏關心的孩子，外顯行為會趨向暴力、易怒或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等偏差行為。

最後，當孩子在家庭被公正的對待、建立彼此的信任，父母對其情感和需求有所回應，建立了關心關係，最後孩子才會認同父母，也就是內化父母所給予的社會規範和價值，如此孩子的社會化才會完全。

（本文作者：陳振盛為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李麗雲為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青少年、偏差行為、家庭結構、家庭互動模式、家庭氣氛

📖 註 釋

註 1 : www.sowf.moi.gov.tw/stat/.../99 年單親家庭狀況調查統計結果摘要分析。搜尋日期 2013 年 11 月 5 日。

📖 參考文獻

- 呂清發 (2003)。受保護管束少年親子關係與偏差行為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 何俞 (1992)。不同家庭結構中父母管教方式對子女自尊心與偏差行為之影響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暨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文化大學。
- 吳奕萱 (2006)。家庭危機與轉機－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和偏差行為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碩士論文。臺中：靜宜大學。
- 沈瓊桃 (2005)。兒童知覺的雙重家庭暴力經驗與其適應行為之相關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18)，25-64 頁。
- 沈瓊桃 (2006)。婚暴並兒虐發生率之初探－以南投現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9(4)，331-363 頁。
- 周思源 (Sze-Yuan Chou)；李玫姿 (Mei-Pzu Lee)；梁文敏 (Wen-Miin Liang)；張麗惠 (Li-Hui Chang)；郭憲華 (Hsien-Hwa Kuo)；賴璟賢 (Jiin-Shain Lai)；朱日橋 (Jih-Chiao Chu)；郭憲文 (Hsien-Wen Kuo) (2006)。臺灣地區在學青少年藥物使用行為與其家庭型態特性之相關性。《Mid-Taiwan Journal of Medicine》，11(4)，243-251。
- 周榛嫻、溫淑盈 (2004)。家庭結構、家庭功能、自我控制與兒童問題行為之縱貫性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三期，149-197 頁。
- 周美智 (2001)。家庭因素、子女道德觀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係研究--以雲嘉地區為例。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南華大學。
- 林佩珊、賀湘邦、王以仁 (2012)。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親子關係、自我控制與其偏差行為之現況分析。《家庭教育雙月刊》，第 39 期，6-20 頁。
- 法務部 (2011)。100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臺北：法務部。
- 卓紋君、廖文如 (2004)。從生態系統觀點看兒童虐待與救治之道－一個兒虐案例的分析。《諮商與輔導》，220 期，10-17 頁。
- 侯崇文 (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探討。《應用心理學》，第 11 期，25-43 頁。

- 許憶真(2003)。父母管教方式及國小學生自我概念對其偏差行為之相關研究。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靜宜大學。
- 郭慧敏(2005)。從家庭結構、社會控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探討青少年不良行為。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臺北大學。
- 陳羿足(1999)。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家庭因素研究--以臺中地區為例。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南華大學。
- 陳雯君(2008)。親子關係對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研究。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銘傳大學。
- 張楓明(2006)。親子、師生及同儕關係對國中學生初次偏差行為影響之動分析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南：國立臺南大學。
- 陳貞妃(2002)。從婚姻暴力談家庭教育的介入模式與輔導策略。諮商與輔導, 202, 14-18。
- 陳振盛(2007)。矯正人員對矯正處遇機制的建構—以矯正學校明陽中學為例。犯罪學期刊, 10 (2), 55-89 頁。
- 黃惠玲(2004)。父母管教方式、差別同儕結合與少年偏差行為相關之探討。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發表, 臺中。
- 黃聖紘(2004)。窮孩子、低成就? 家庭貧窮對子女教育成就與生涯選擇的影響。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臺灣大學。
- 楊芳梅(2007)。國中生目睹父母婚姻暴力、親子關係與偏差行為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中正大學。
- 詹宜華、張楓明、董旭英(2012)。國中生接觸偏差同儕, 其衝動性格, 知覺父母監督與偏差行為間關聯性之中介效果。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第 18 期, 89-123 頁。
- 廖經臺(2002)。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家庭因素分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暨社會科教育研究所, 社會科學學報, 第一期, 29-41 頁。
- 鄭麗珍(2001)。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臺大社工學刊, 第五期, 197-270 頁。
- 蔡佳芬(1999)。影響繼親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為家庭因素之相關分析研究--以大臺北地區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 蔡松榆(2003)。國中生父母親教養知覺、家庭生活適應與偏差行為之關係研究。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中正大學。
- 謝智玲(2007)。異國婚姻家庭的父母管教、參與學校教育與子女行為適應之調查研究。大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3(2), 81-95 頁。
- 謝品蘭(1992)。單親家庭親子關係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以離婚分居家庭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東吳大學。

- 譚子文、董旭英 (2009)。目睹婚姻暴力和臺灣會區國中生受虐程度關聯性之研究。《臺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1(2)，101-137 頁。
- 蘇益智 (2005)。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身心發展影響之探討。《諮商與輔導》，236，60-62 頁。
- Chandler, M. J. (1973). Egocentrism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The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of Social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9, 326-332.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irschi, T. (1969). *Cause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ffman, M., L. (1977). Moral Internalization: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emper, T.D. (1979). *A Social Interactional Theory of Emotions*. New York: Wiley.
- Maccoby, E.E. & Martin, J.,A.(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4. New York: Wiley.
- Moos, R. H. & Moos, B. S. (1975). *Evaluating correctional and community settings* (pp. 263-287).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Shott, S. (1979). "Emotion and social life: A Symbolic Intera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pp.1317-1334.
- Scheff, T. (1988). "Shame and Conformity: The Deference-Emotion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pp.395-406.